

双循环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日本的经验与启示

田 正¹，李 鑫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2.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在资本投入收益率下降、劳动力投入下滑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构筑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国际经济学理论，构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双循环体系经济理论模型，通过经济模拟的方法，可以看出双循环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分析日本在构建双循环体系领域的尝试，不难发现其外循环成功，而内循环失败。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发泡沫经济，造成日本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的长期低迷。中国应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加强政府引领，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平稳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市场规模；泡沫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21)03-0130-13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型关键时期，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困难和挑战。着眼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国内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对双循环构建问题展开研究。贾根良分析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探讨国内大循环对促进中西部发展的积极作用^[1]。袁国宝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层内涵、战略意义和政策措施^[2]。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试图构建经济双循环体系，其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参考。严学旺分析了日本政府推动经济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的举措，但是，对于日本构建双循环的经验和教训问题探讨并不充分，尚未理论性、系统性地分析这一问题^[3]。本文使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双循环构建的内在逻辑，采用经济模拟与案例分析研究的方法，探讨日本构建双循环体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中国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必要性，分析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剖析日本在构建双循环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收稿日期】2021-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后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验与教训研究”(17CGJ012)

【作者简介】田正(1988—)，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日本经济；李鑫(1984—)，男，四川西昌人，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主任科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一、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国经济维持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投资收益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有其必要性。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短期内为推动经济增长可依靠增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资源投入的做法，而在长期内投资收益和劳动力投入均会下降，为此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中去除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因素。从长期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源泉，由于劳动力资源有限，且资本投入会面临报酬递减问题，保持经济增长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由此可见，在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以及劳动力投入不能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一国经济维持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加。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有限的现状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本投入有限和劳动投入有限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资本投入的有限性。根据经济增长理论，随着资本积累的持续增长，最终会因为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而抑制企业开展投资的意愿，使得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下降。企业根据投资收益率情况，决定投资活动的开展。企业的投资收益率由资本收益、资本消耗率和资本价格增长率三项因素共同决定^{[4][92]}。在资本价格增速不变而资本消耗率持续上升且资本收益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收益将会下降，届时企业将停止投资行为。随着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资本系数将会不断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收益的持续下降。资本收益的持续下降，将会导致企业投资收益率的下降，进而减少企业投资。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驱动的，资本投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1978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1996年1月至2007年12月，中国的月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均值高达21.8%，是同期GDP增速的1倍以上^{[5][18]}。但是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趋于下降，企业投资也趋于减少。在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2008年之前的20%，下降到2019年的5%~6%。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是由企业做出的，固定投资增速的下滑反映了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现状。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达到峰值，此后逐渐进入平台期^[6]。由此可见，随着投资回报率的降低，中国的投资趋于下降。

其次，劳动投入的有限性。劳动力投入的持续增加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享受了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的不断涌入，经济发展速度得到提升。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未来劳动要素的投入将会减少。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增加。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10%的水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人口红利贡献巨大。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66.7%，提升到2010年的74.5%。1978—2007年，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为获得更高的收入，不断涌入城市，为城市地区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开

始减少,人口结构出现了快速转变,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出现下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6.7%上升到2010年74.5%的峰值,2018年下降到了71.2%^[7]。这说明,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是2010年,从2011年起,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开始衰减。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人口结构会进一步演化,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会进一步缩小。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继续依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需要将经济增长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三) 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下降的背景下,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推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不高。1979—2004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9.46%^[8]。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可以引进和利用的技术正在减少,以往通过技术引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也在变窄。在这一背景下,就需要中国加强自主创新,通过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部门企业的生产率,同时带动国内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势必需要寻求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继续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新机制与新动力,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的模型构建

在资本劳动力下降背景下,就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就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下通过构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经济模型,并通过模拟分析,说明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关键因素。

(一) 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经济学相关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开展国际贸易行为,有助于提升其技术水平。国内公司通过出口业务接触到外国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国内公司技术能力的提高又会促进其生产率增长。因此,从事出口的公司通常比非出口公司的生产率要高。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出口学习效应,即通过与外国客户的业务往来提升自身的生产经营技术。另一方面,进口贸易可以引进外国技术知识,增加国内技术存量,提高国内生产率^{[9]91-95}。

企业通过在国际领域的生产活动,获得技术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源于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则源于向技术前沿企业的模仿。企业可以在外循环过程中所获得的生产经营技术,应用和扩散至国内企业,从而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国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这一方式,形成国内国际两个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作用,共同推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能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问题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市场规模的大小。如果市场规模足够大,则企业具有充足的空间,在外循环中所获得的技术应用于国内市场之中,从而可以开展技术研发,实施大规模、充分的检验,不断完善技术的应用水平,这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但是,如果市场规模有限,则通过外循环所获得的技术,将不能通过在国内的大规模试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这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市场规模的大小在双循环经济系统

的技术水平提升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否维持和建设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

(二) 双循环体系的理论模型构建

参考多位学者关于技术模仿以及技术创新异质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设定^[10-15]，并结合数位学者关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差异以及研发税收激励等差异化特征和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文献^[16-17]，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双循环体系的理论模型，通过该模型简要分析双循环体系对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定量影响。

该模型由消费者和异质性生产者组成。代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的形式如下：

$$u(c_{i,t}) = \sum_{i=0}^n \beta_i \ln(c_{i,t}), \quad (1)$$

其中 β_i 为该消费者的主观贴现因子。假定消费者是同质的且满足连续统分布条件，即 $i \in [0,1]$ 。

异质性生产者分为最终品生产者和中间品生产者。最终品生产者将中间品生产者生产的中间品打包成可供消费者消费的最终商品 $Y_t = (\int_0^1 Y_{i,t}^{\eta-1/\eta})^{\eta/\eta-1}$ 。中间品生产者是垄断竞争的，也满足连续统分布即 $i \in [0,1]$ 。中间品生产者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如下所示：

$$Y_{i,t} = A_{i,t} K_{i,t}^a L_{i,t}^{1-a} \quad (2)$$

中间品生产者全要素生产率 $A_{i,t}$ ，取对数后形式为 $\hat{a}_{i,t} \equiv \ln(A_{i,t})$ 。中间品生产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两种策略，即模仿和创新。考虑到现实经济中双循环的特征，本文假定模仿策略适用于外循环，同时创新策略适用于内循环。在模仿策略下，中间品生产者通过与外国厂商接触和交互，获得技术水平的提升。在这一策略下，中间生产者的全要素生产率每期以 q 的概率向前沿水平收敛，收敛的速度为 $\hat{a}_{i,t+1} = \hat{a}_{i,t} + \tilde{a}$ 。

在创新策略下，中间生产者通过自主研发的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研发成功的概率为 $p_i(M)$ 。若自行研发失败，则中间生产者采用模仿策略，因此创新策略下中间生产者全要素生产率的期望增长率如下式所示：

$$p_i(M)F_a + (1 - p_i(M))q(1 - F_a) \quad (3)$$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市场的规模 M 大小是影响创新成功率的关键因素。市场规模越大，则创新的试错成本越小，因此 $p_i(M)$ 就越大。

此外，产品市场满足 $Y_t = C_t + I_t$ ，资本市场满足 $I_t = K_{t+1} - (1 - \delta)K_t$ 。消费者和异质性生产者的出清条件为：

$$\frac{1 + g_{t+1}}{C_t} = \frac{1}{C_{t+1}} \beta_t (r_{t+1} + 1 - \delta); \quad (4)$$

$$y_t = c_t + k_{t+1} + (1 - \delta)k_t; \quad (5)$$

$$r_t = \left(\frac{k_t}{A_t}\right)^{a-1} a^2; \quad (6)$$

$$y_t = A_t k_t^a ; \quad (7)$$

$$g_t = [p_i(M)F_a + (1-p_i(M))q(1-F_a)]\tilde{a}\left(\frac{k_t}{A_t}\right)^\eta . \quad (8)$$

以上式(4)为消费者欧拉条件、式(5)为产品市场出清条件、式(6)为资本市场出清条件、式(7)为总生产函数、式(8)为经济平衡增长率。

(三) 双循环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影响的模拟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双循环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设置了两个不同的双循环体系参数 $M_1/M_0 = 4$, 即双循环体系强的条件下国内市场规模是双循环体系弱条件下的4倍。

参考 König 等的相关参数^[18], 本文将 $p_i(M)$ 设置为均匀分布, δ 设置为 0.98, q 设置为 0.65, η 设置为 4.5, 同时将技术进步的外生冲击 \tilde{a} 设置为 0.1。在不同的双循环体系下, 技术进步外生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影响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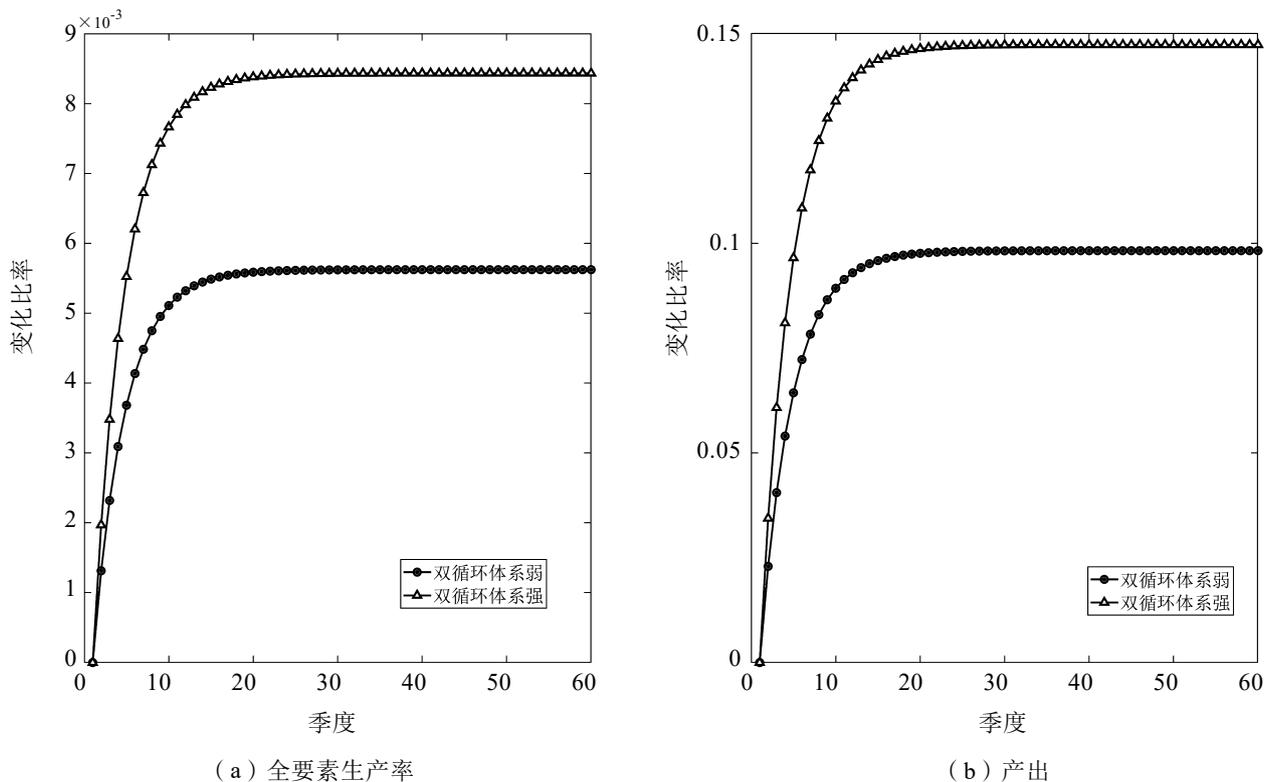


图 1 模拟分析结果

从图 1 可以看出, 双循环体系较强的条件下, 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都要快于双循环体系较弱的条件。此外, 在第 3 期之前, 以外循环为主的两个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差异并不大, 主要原因是中间品生产者均采用模仿策略追赶国际前沿技术; 在第 3 期以后, 双循环体系较强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更大, 中间品生产者研发成本更小, 采用创新策略获得的技术进步更为显著, 因此在中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持续高于双循环体系较弱的经济体。

由此可见, 国内市场规模的大小对于中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市场规模越大则越有助于提升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产出。能否维持一个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是双循环构建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三、双循环体系构建的尝试：日本的案例

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国参考。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日本政府没有提出类似“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张，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同样面临着日美贸易摩擦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形势较为相似；并且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推行扩大内需的国内经济政策，随着日元汇率的持续上升，日本企业也开始积极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日本实施的一系列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与当前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较为相似，日本的案例无疑为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例。为此，下文将着重探讨日本构建双循环体系的经验和教训，特别着重从国内市场构建以及维持市场规模的角度切入，探寻日本是否成功构建了双循环体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经验与教训。

（一）日本构建外循环体系的措施及效果

通过观察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可以加深和理解一国经济体双循环的程度，特别是对外循环的力度。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值与该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①图2反映了日本在1957—2019年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变化。以《广场协议》签署的1985年为节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出现了显著变化。在1957—1985年间，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变化较为平稳，稳定在20%左右，均值为22.65%；在1985—2019年间，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又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85—1995年为第一个阶段，此时日本政府致力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构建，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日本的国内需求，与此同时也积极推动经济的国际化策略，推动日本企业走向海外，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反映在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上，就是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从1985年的22.16%，快速下降到了1995年的14.14%，净出口与GDP比值也从3.36%下降到了1.94%。这说明，日本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在不断降低，试图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与此相对应的是，从1996年开始日本的对外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反映在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上，就是贸易依存度在不断上升，从1996年的15.55%，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29.81%，并持续处于高位，2019年达到27.09%。这表明，在这一时期，日本没有形成以国内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主导的格局，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再次依赖于国外需求，这也能够反映出日本推进双循环构建的尝试，因为国内循环构建不畅，导致国内国际双循环没有完全形成，日本对于外循环的依赖程度持续加深，没有通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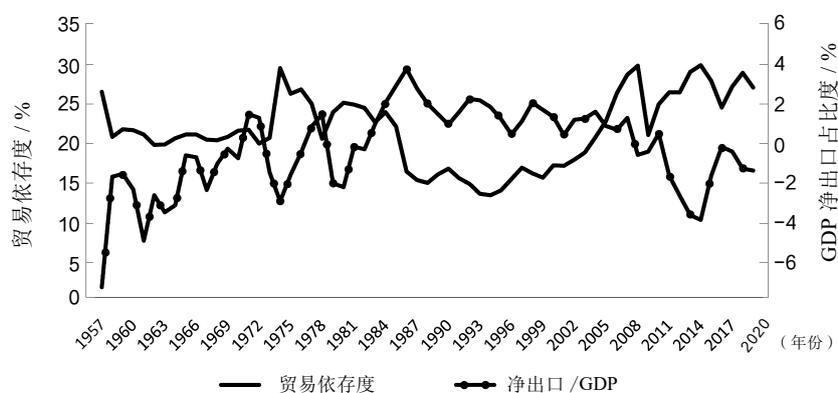


图2 日本贸易依存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内閣府《国民経済計算》^[19]，財務省《貿易統計》^[20]

^① 贸易依存度的测算方法为： $FTD=(EX + IM)/GDP$ ；其中EX表示出口总额，IM表示进口总额，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1985—1995年,日本为推动外循环的构建采取了诸多措施。在战后初期,日本政府采取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大规模、积极地引进欧美等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并且为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对外汇和外资实施严格管控。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日本逐步推行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逐步提升进口产品自由化比率,放松外汇管制,放宽出口贸易管制,逐步取消外国资本进入日本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持续增强,日本对外贸易顺差逐渐增大,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日美两国间的摩擦领域不仅包括汽车、半导体等制造产业,还涉及商业交易习惯、企业系列制等经济制度问题^{[21]34}。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和美国之间签署了《日美半导体协议》《日美结构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包含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增强对外开放等内容。特别是《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选择在海外开展生产活动。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开始推出促进外循环的相关政策。一是推动多边主义合作。日本在1951年加入了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逐步开始推行贸易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为了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压力,转而依靠多边主义合作,试图通过多边主义的制度构建缓冲日美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设立,参与国际协调。1993年WTO成立后,贸易纠纷可以通过国际性秩序来解决,推动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日本政府致力于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日欧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经济贸易伙伴合作协议的达成、实施,其意图是明显的,即进一步扩大日本的外需市场,增进日本的外循环。二是促进进口数量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扩大购买外国商品和服务。1989年,通产省实施“进口促进事业”政策,采取以下措施扩大进口,如:接待对日通商调查团,派遣专家赴海外调查、举办外国商品展览会、降低非关税壁垒等^{[22]559}。三是加强海外经济合作。ODA(政府开发援助合作)是日本开展海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ODA发展迅速,并在1986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援助国,仅次于美国^[23]。

日本在外循环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本的对外投资大规模增加。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加,从1983年的36.12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64.52亿美元,1989年达到了441.3亿美元^[24]。二是日本的对外贸易不断扩展。1985—1995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从41.9万亿日元,增加到了73.07万亿日元,增加了1.7倍^[25]。三是日本跨国企业快速发展。《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跨国企业迅速壮大,开始实现全方位的国际化发展,以世界市场为目标,不断在世界各地配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收益,试图实现整体利润的最大化^[26]。日本的跨国公司积极开展跨国经营活动,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了跨国公司的生产率。深尾京司的研究证明,开展海外活动的企业,能够扩大经营收益和雇佣水平,并且对提升生产率有正向作用^{[27]338}。

(二)日本构筑内循环体系的措施及效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日美贸易摩擦的压力下,美国要求日本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为此日本也实施了一系列与内循环构建相关的举措。1986年,由日本银行总裁前川春雄撰写、提交的“前川报告”提出和总结了日本为改善经济结构所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扩大内需、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日元国际化、促进对外经济合作等。

第一,日本推进内循环构建的举措。为了缩小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日美两国之间签署了《日美结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日本需要采取扩大内需的经济措施。与此同

时,《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快速升值,为了应对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出口能力下降,日本也采取了宽松的总需求管理措施。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压力,自1985年以后,日本在财政支出上,开始实施扩张措施。1986年和1987年出台了总额达9.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措施。在1985—1990年间,日本的财政支出增长率达到5.5%,而1981—1985年间为4.4%^[28]^[182]。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从1986—1987年,日本连续五次下调贴现率,达到2.5%。与此同时增加国内的货币供给量,在1987—1989年的3年时间内,日本的货币供给量年增速均超过了10%。三是推动城市土地开发和建设。日本政府于1987年出台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提出建造办公大楼、设立休闲游览地等,用于国土开发的投资达到1000万亿日元^[29]。

第二,日本推进内循环构建所取得的效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积极推行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扩大内需、缩小对美顺差的作用,但是在中长期内却引发泡沫经济,导致国内市场无法进一步扩大,不利于跨国公司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从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阻碍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增速长期低迷,并延续至今,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以下通过日本居民消费、国内投资总额、政府经常性支出、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变化来分析日本内外循环构建的效果。图3反映出1970—2019年居民消费、国内投资、政府支出以及贸易总额与日本GDP的比值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50%左右,1985年为52.52%,2019年则为55.22%。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地位,自日本试图构建双循环体系以来,变化幅度不大。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较为明显,从1990年的32.7%,下降到了2019年的24.56%。这说明,泡沫经济崩溃严重打击了日本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对于设备投资的积极性迅速下降。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经常性支出与GDP的比值则呈现出迅速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4.28%上升到2019年的20.01%。这说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正依靠政府支出的扩大弥补经济总需求的不足。此外,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也同样表现出了快速上升的趋势,从1994年的16.1%上升到2019年的34.81%,这说明日本经济对于对外经济乃至外循环的依赖程度,在1995年双循环体系构建失败后不断扩大,当前的日本经济发展更倾向于依赖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贸易,而国内需求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则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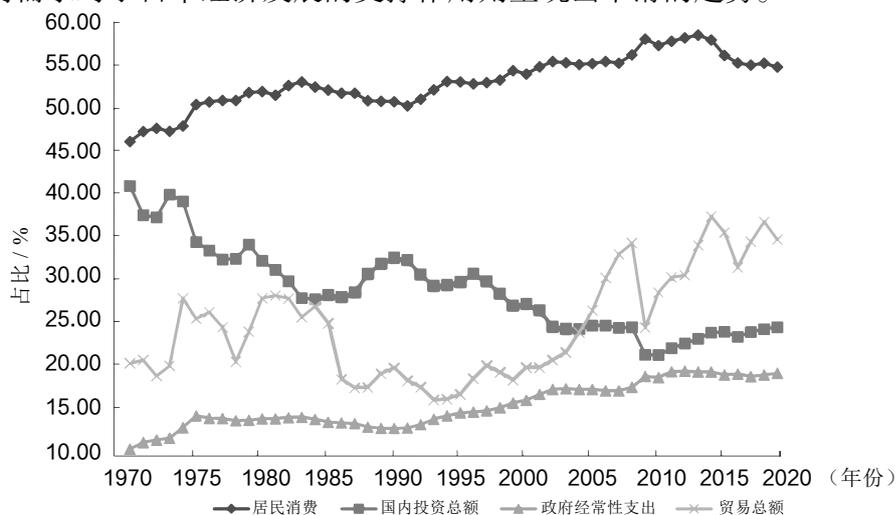


图3 日本居民消费、国内投资总额、政府经常性支出、贸易总额在GDP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内閣府《国民经济计算》^[19],財務省《贸易统计》^[20]。

由上可见,日本在推行构建内循环的经济政策之后,居民消费与GDP之比没有明显提升,且国内投资与GDP之比迅速下降,这说明在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后,不仅没

有发挥扩大内需的经济效果,反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的现象。构建内循环的政策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短期内扩大了国内需求,减少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后,日本国内需求出现上升,个人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从1985年的7409.95亿美元、3781.05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2.91万亿美元和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有所下降,从1986年的517.6亿美元下降至1996年的324.6亿美元。从短期来看,日本扩大需求的政策,确实起到了增加国内需求、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的作用。二是在中期内引发了泡沫经济,致使资产配置扭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日本企业的融资方式逐步多样化,对银行的依赖下降,而此时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金融体系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这些资金并未运用至实体经济部门,而是被应用于股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引发泡沫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形成资产泡沫。三是在长期内,泡沫经济的崩溃抑制日本的居民消费,降低日本的国内投资,无法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的居民消费、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无法增加消费,同时日本企业则在积极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减少负债,无力扩大设备投资,居民消费和设备投资维持长期低迷,导致市场规模无法持续扩大。1995年日本的私人消费为2.91万亿美元,2019年日本的私人消费只有2.8万亿美元,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没有出现显著增长。而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更是出现下降的态势,1996年为1.46万亿美元,到2019年为1.23万亿美元,不仅没有出现增长,反而呈现了长期下滑的态势^[30]。日本没有形成畅通的国内循环市场。

(三) 日本双循环构建成败分析

在分析了日本构建外循环和内循环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日本在外循环的构建上相对较为成功,日本诸多企业获得了国际化发展,形成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跨国企业集团。但是,日本在内循环建设方面却是失败的,没有建设和形成国内大市场以及提升市场规模,这虽然有国土面积狭小的客观因素,但这也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施错误的经济政策密不可分,从而使得日本没有进一步维持和扩大国内市场,遏制了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没有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探讨日本双循环体系构建失败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经过前文的经济理论分析可知,能否成功构建双循环体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构建一个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市场长期低迷,不利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维持,进而没有形成双循环体系。造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试图构建双循环失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没有对金融部门实现有效监管,导致泡沫经济的发生。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日本选择对美国的金融企业开放金融市场业务,而对国内的金融企业仍然有着较多的限制。在众多限制条件之下,日本国内金融部门无法开展有效的金融创新,仍然只能通过增加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获得收益,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的助推下,形成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发生则对内循环的构建形成严重负面影响。

第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手段,导致日本的实体经济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金融体系的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从而引发泡沫经济,阻碍产业升级。在日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日美结构协议》要求日本政府减少经济的要求,从而使得日本逐步放弃了战后以来所实施的针对特定产业部门的产业政策。日本产业政策此后

转向致力于完善市场制度的构建，减少对特定产业部门的直接干预，但是自战后以来日本已经实施针对特定产业部门的产业政策达 30 余年，这使得长期依赖政府引领的大企业（特别是重化学工业企业）丧失了产业升级发展的方向，大企业的大量资金没有用于实体经济，而是投资于资本市场，以追求获得短期的资本收益，从而导致泡沫经济。

第三，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致力于偿还自身的债务负担，无力开展进一步的设备投资。随着企业收益持续下降，居民收入也持续下降，进一步抑制了日本居民的消费，国内大循环市场无法形成。泡沫经济不仅使得国内的企业丧失了进一步加大设备投资的动力，而且也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导致日本国内需求持续下滑，无法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建设提供有效支撑。资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企业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调整为实现债务最小化，企业因而会把经营所获得的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企业债务，而不是用于投资，企业对于设备投资的需求日趋下降。企业经营情况的恶化，导致企业员工的收入常年得不到提高。此外，21 世纪后，随着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的实施，在日本劳动力市场中兼职员工的比率持续上升，而全职员工的比率则在下降，这不仅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还使得正规员工的工资没有上涨压力，因为其可以被兼职员工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为员工提升工资的动机，日本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停滞不前。由于员工收入水平长期难以提高，抑制了消费水平的提升，导致国内市场无法为日本跨国企业的生产技术提供有效的试错空间，更加不利于双循环体系的形成。

构建双循环失败的后果，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到限制，对日本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一是日本虽然积极开展了外循环，诸多企业走出国内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但是日本国内市场规模长期有限，跨国公司无法将在国际生产中所获得的技术应用于国内市场，开展进一步的创新，降低创新所需成本，难以带动国内企业提高生产率。因为没有形成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日本的国内市场始终处于较小且有限的状态，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无法通过在国内大市场中的试错获得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也就无法带动国内企业提高生产率。二是双循环体系构建不畅，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低迷，进而致使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之中。由于双循环体系构建不畅，跨国公司的技术无法通过在国内大市场中的试错，降低创新成本，从而无法带动国内企业部门的技术水平提高，也就无法促进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陷入停滞，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 1991—2000 年间为 -0.06%，在 2000—2010 年间则为 0.46%^[31]。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低迷，阻碍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日本虽然构建了外循环体系，但是因为内循环体系构建不畅，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导致日本经济没有显著发展。

四、经验与启示

日本构建双循环的尝试，为中国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政策措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需要吸收日本的经验教训，有效推进中国双循环体系建设。

（一）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20 世纪 80 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日本为了应对这一压力，积极推进经济的国际化，同时也不断扩大国内需求，试图实现“外需”与“内需”的双循环，但是由于内循环构建不畅，没有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导致最终没有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阻碍了全

要生产率的提升，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陷于经济长期低迷之中。从日本的案例中，可以获得如下经验和教训。

一是构筑外循环体系，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有助于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日本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积极加入多边贸易合作组织，寻求多边经济贸易合作，加强政府对外开发援助，构建与海外国家的联系网络。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形成一批跨国企业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仅推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促进了跨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提升了国际经济部门的生产率水平。

二是在构建内循环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不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还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了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扩大国内需求。但是，由于金融监管落后以及产业政策缺失，日本的国内企业未将资金用于提升生产率的设备投资上，而是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非实体金融资产上，以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在企业和金融部门的相互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产生经济泡沫，而泡沫经济的崩溃则严重打击了企业设备投资的积极性、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造成国内需求的持续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后，通货紧缩问题困扰日本经济发展，随着非正式员工比率的上升，员工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进一步导致了内需的下滑。日本在扩大内需上的尝试，不仅没有有效推进内循环的形成，扩大国内的市场规模，反而引发严重后果，导致日本的国内市场不断缩小，与扩大内需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是日本虽然在构筑外循环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因为没有构筑有效的内循环，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终使得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于长期低迷之中。通过外循环，可以促进跨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获得提升，但需要通过在国内大市场中的试错降低创新成本，进而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因为内循环构建缺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企业投资和国内消费水平长期低迷，导致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经营活动中所获得的技术无法通过试错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从而也就无法带动国内企业提升生产率，导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抑制经济发展。由此可见，双循环体系是外循环和内循环紧密循环的完整体系，而国内循环的构建与扩展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因为没有有效构建内循环体系，导致双循环体系构建失败。

（二）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新格局，可以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为此，应吸取日本20世纪80年代双循环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通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有力保证。

第一，中国应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构建，实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挑战。从长期看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具有有限性，维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长期内维持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构建，通过外循环企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带动国内企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协调国内国际双循环平稳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构建离不开政府的引领，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日本正是因为没有有效统筹协调好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的关系，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从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长期陷于低迷之中。为此，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自主创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

第三, 加强对外经济合作,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建设, 构建国际经济良性循环。日本通过加强多边主义合作、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加强与海外国家联系等方式, 较为有效地构建了外循环经济体系, 甚至成为当前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 中国应汲取日本的经验, 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 通过“一带一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 加强参与国际经贸谈判和制定。通过加强外循环, 促进外向型企业提高生产率,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扩大国内需求, 建设广阔的国内市场, 形成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日本在内循环构筑方面存在深刻教训, 金融监管落后以及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发泡沫经济, 而泡沫经济的崩溃则严重打击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 导致日本没有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阻碍了双循环体系的形成。为此, 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 认识到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关键在于构建广阔的国内市场, 维持和扩大市场规模。与日本不同的是, 中国拥有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条件, 需求的收入弹性大等条件, 能够为构建国内大市场提供充足条件。为此, 就需要促进供需关系动态平衡, 增加居民收入, 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 激活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 从而形成全领域、多层次、动态性的内需体系。

第五,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双循环构建提供良好环境基础。2015年以来, 中国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并取得一系列成果, 同时在2020年又提出要素市场化改革,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利条件。为构建完整的双循环体系, 就需要将国际性企业的生产技术在国内外大市场中试错, 从而加快创新步伐, 而这正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体制, 消除资源配置障碍, 从而降低国际部门的生产技术引入国内部门所需要的成本。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双循环的构建提供良好支持, 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贾根良.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与中西部大开发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6(6): 103-113.
- [2] 袁国宝. 双循环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1.
- [3] 严学旺. 日本经济转轨成功——实现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 [J]. 现代日本经济, 1989(4): 5-8.
- [4] [日]深尾京司. 世界経済史から見た日本の成長と停滞 [M]. 東京: 岩波書店, 2020.
- [5] 张明. 宏观中国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20.
- [6] 刘世锦. 宏观经济走势与新增长动能 [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1): 25-28.
- [7] 陆旸, 蔡昉.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比较 [J]. 世界经济, 2014(1): 3-29.
- [8]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1979—2004 [J]. 经济研究, 2005(6): 51-60.
- [9] [美]布朗温·霍尔, 内森·罗森伯格. 创新经济学手册 (第二卷) [M].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 [10] Aghion P,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J]. *Econometrica*. 1992, 60(2): 323-351.
- [11] Acemoglu D, Aghion P, Zilibotti F.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6, 4(1): 37-74.
- [12] Lucas Jr R E, Moll B. Knowledge growth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122(1): 1-51.
- [13] König M D, Lorenz J, Zilibotti F. Innovation vs. imi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s [J].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16, 11(3): 1053-1102.
- [14] Benhabib J, Perla J, Tonetti C. Reconciling models of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 a theory of the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and technology frontier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1): 1-31.
- [15] Acemoglu U, Kerr W R.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126(4): 1374-1443.
- [16] Bai CE, Hsieh C T, Song Z M. The long shadow of a fiscal expansion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11):

- [17] Jia J, Ma G. Do R&D tax incentives work?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6): 50-66.
- [18] König M, Song Z M, Storesletten K, Zilibotti F.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0(6): 1-45.
- [19] 日本内閣府. 國民經濟計算 [EB/OL]. <https://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 2020-11-15.
- [20] 日本財務省. 貿易統計 [EB/OL].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index.htm>, 2020-11-18.
- [21] 徐梅. 日美貿易摩擦再探討 [M].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6.
- [22] [日]尾高焯之助. 通商産業政策史 1980-2000(第1卷) [M]. 東京: 經濟産業調査会, 2013.
- [23] 王妍. 日本对外援助的发展及政策演变 [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7): 51-56.
- [24]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直接投資統計 [EB/OL]. <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html>, 2020-11-20.
- [25] 日本財務省. 貿易統計年別輸出入總額 [EB/OL].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nenbet.htm>, 2020-11-22.
- [26] 钟红. 日本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及发展趋势 [J]. 日本学刊, 1994(5): 53-66.
- [27] [日]深尾京司, 宮川努, 安田武彦. 生産性と日本の經濟成長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8.
- [28] 陈共, 宋兴义. 日本财政政策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 [29] 张季风.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 [30] 日本内閣府. 國民經濟計算年次推計 [EB/OL]. https://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kakuhou/files/files_kakuhou.html, 2020-11-24.
- [31] 日本經濟産業研究所. JIP Database 2015 [EB/OL]. <https://www.rieti.go.jp/en/database/JIP2015/>, 2020-11-22.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dition of Dual Circulation: Japan'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TIAN Zheng¹, LI Xin²

(1.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7; 2. Chengdu Branc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clining return on capital input and declining labor input, China needs to build a patter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o enhanc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doptin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dual circulation system. Through economic simulation it finds that the key to build the dual system lies in expanding the scale of domestic market. By analyzing Japan's attempt to build a dual circulation system,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works well while the internal one runs opposite. The wrong macroeconomic policy has triggered a bubble economy, resulting in a long-term downturn in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s experience, strengthen government guid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dual circulation.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market size; bubble economy

[责任编辑 赵立庆]